

从“活动”到“运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考察

■汤水清 李小萍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社会影响深远的大事。从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看,为期20多年的这段历史经历了兴起、高潮和退潮三个阶段,其性质也从最初发展农业生产的垦荒活动,到调控劳动力就业的手段,最终转变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纵观这段历史,“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是国家计划经济条件下调剂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以社会进步抑或从知识青年一代整个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总体上都应加以否定,但它对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乃至少数城镇青年的成长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江西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6)10-0119-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

汤水清,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南昌 330077)

李小萍,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江西南昌 330022)

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历史上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社会影响深远的大事。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知青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考察对象也逐渐从全国延伸到部分地方,从宏大叙事深入到某一专题。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知识青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过程,知青在农村的生产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多方面影响。江西是全国最早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省份之一,然而至今还未见对该省知青问题的系统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以金光耀、金大陆主编的《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

辑录》为基础,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的历史过程及其阶段性特点进行初步考察,并力求对此作出简要、客观的评价。

一、上山下乡:一段城镇知识青年的历史

从1955年10月上海城市青年组成垦荒队奔赴鄱阳湖滨江西德安建立共青社,到1981年全省停止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历时26年。这26年又可以分为三个性质、规模、特点各不相同的阶段。

(一)兴起阶段(1955—1966)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江西始于1955年。^①当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做好动员

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在倡导来自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的同时,首次提出动员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去的问题。9月,毛泽东在为中共河南省许昌地委农村工作部撰写的一篇介绍农业合作化经验的文章所写的按语中说,组织中、小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P462)}。与此同时,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开荒3868万亩,共青团中央在其中承担了部分任务。为完成任务,团中央组建了青年自愿垦荒队,许多城市的知识青年也热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自愿奔赴农村垦荒。1955年10月18日,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首批98人举着“向困难进军,把荒地变成良田”的队旗,到达德安拖沟岭安家落户,就是响应这一号召的举措。这批知识青年的到来,是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此拉开了序幕。

随后,德安所属的九江专区专门成立了接收安置委员会,陆续接收安置了上海垦荒青年2.5万人^{[2](P3019)};南昌市也组织了本土第一支100多人的知识青年志愿垦荒队,在进贤县建立了第一个单独核算的青年农庄。

随着城镇青年就业压力的增加,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各地按照具体情况,分别在5年或7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纲要(草案)》指出:“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副、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3](P50)}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该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生毕业的青年,“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4](P579)}。当年,就有大量城镇青年下到农村,仅南昌市就有近千人下乡。^{[2](P2989)}

1958年,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影响,城镇职

工需求大增,上山下乡几乎停顿。1960年,“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造成经济严重困难,国家因此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城镇又开始大量精简职工和减少人口,上山下乡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许多地方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各地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文化大革命”前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上山下乡从此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据统计,江西省1962年和1963年动员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7万余人,而1964年9月至1965年9月,动员了5.3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P2980)}1966年上半年江西全省再次动员了6万余名城镇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2](P2965)}“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各校停课闹革命,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上山下乡也处于停顿状态。

这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有四个显著特点:一是从50年代突出兴建大批垦殖场,转向60年代集中插队落户;二是上山下乡的目的侧重于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减轻城市压力;三是上山下乡主要采取个人自愿与国家动员相结合的办法;四是始于垦荒活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实质主要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调控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场群众性运动。

(二)高潮阶段(1967—1975)

“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党政机构被砸烂。1968年,各地先后建起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社会秩序得以初步恢复,参加串联的红卫兵纷纷回到学校。但对于已毕业的66、67、68届初高中毕业生来说,学校已对他们关闭了大门,工厂也因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停止了招工。如何解决滞留在社会上的1300多万初高中毕业生的出路就成为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为此,196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在转发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

批示中,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本着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方针,对大中小学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予以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当年夏,各地按照“四个面向”的方针开始了对毕业生的分配工作。7月25日,江西南昌地区大中专院校也有7000余名毕业生下乡下厂当工人、农民。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上山下乡从此前主要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转而成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场改造运动。江西与全国一样,迅速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高潮。至12月底,全省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生到农村落户的有98 610人,社会知识青年到农村落户的有30 787人,同时有87所中学35 240名学生由城市迁往农村,还有5000余名大学生当普通农民。加之随父母下放的知青,总数为20余万人。^{[5](P326)}1969年又有20余万城镇青年下放到农村,并于4月接受了3万余名上海知青来江西农村插队落户。到1970年8月,全省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达37万余人。^{[2](P2976)}

1970年,随着生产的恢复发展,加上盲目“铺摊子”,扩大基建规模,城市用人增多。当时全国原计划1970年、1971年两年增加职工306万人,但实际上增加了933万人。^{[6](P101-102)}由于从应届初高中毕业生中大量招工,下乡人数因而大幅减少。1970—1972年,南昌市平均每年只有1369人下乡,1972年更只有670人,远低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年均数7012人。^{[2](P2990)}1968—1972年全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为39万多人^{[2](P2980)},若扣除1970年以前的下乡知青人数,实际上这两年全省只有两万多知青下乡。

1973年,国家调整国民经济,减少招工。10月31日,江西省革委会发出《关于动员安置1973年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通知》,要符合条件的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和未升学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从城镇招收的其他分校的应届毕业生、中途退学的学生和城镇社会青年,都要上山下乡。由此下乡人数再次增多,到1975年达到一个小高潮。当年南昌市下乡知识青年8416人,下乡人数仅次于1968年,全省仅11月就有5万知识青年下乡。^{[2](P2992,P2996)}

这一阶段,江西省不仅自身动员了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接收了大量的省外知识青年,其中尤以上海知青为主。1969年江西安置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24.44万人,其中来自上海的有3.2万人(1962—1979年间,上海市知识青年迁入江西的共11.8万),约占全省知识青年数的13.09%。九江地区1968年至1972年接收下乡知青31 870人中,上海市知青13 381人,占42.0%。宜春地区1973年下乡知青共有27 976人,其中上海知青13 080人,占46.8%。^{[2](P2975,P3024,P3111)}

这个阶段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狂飙突进和整个社会动乱的必然,也与国民经济停滞、波动紧密相连。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大、接收的上海知青多。特别是与前一阶段相比,其性质发生了完全的改变,成为一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和“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群众性运动。

(三)退潮阶段(1976—1981)

1972年以后国家对于留城和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条件的逐步宽松,尤其是毛泽东的有关批示,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迅速退潮。1976年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致信毛泽东,反映下乡两年的知识青年已被大批招工回城,一些青年农场被拆散,有些社队出现对下乡知青安置培养工作不做长远打算的情况。吴桂贤认为这是“拆台”。12日,毛泽东在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6](P140)}这段批示及随后政治局会议讨论后的决定并未明确知青政策的下一步走向,这就使观望气氛浓厚起来,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如南昌县下乡知青1975年为4528人,1976年迅速下降到872人;乐平县下乡知青从1975年的822人大幅下降到

1976年的182人;余干县包括外地下放知青从上年的509人下降到193人。^{[2](P3006,P3052,P3055)}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转折点。会议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作了较大的调整,改变了过去“一刀切”的做法,指出有条件安置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已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逐步给予解决,其中老知青要限期解决。江西省政府随之也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规定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中学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不动员上山下乡,今后城镇待业人员的就业工作由各系统统筹安排。1979年,进一步明确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的范围为南昌、景德镇、萍乡、九江、赣州、上饶、吉安、抚州、鹰潭(1980年增加宜春市)。实际上,除南昌市在1979年继续动员了少量知青下放到近郊知青厂、场、队外,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至此已基本停止。当年,全省上山下乡知青仅2089人。^{[2](P2980)}1981年起,江西不再动员知青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至此结束。

据统计,江西全省从1962—1979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63.5万人,其中,1962—1967年占12.3%,1968—1976年占86.9%。^{[2](P2974)}持续20多年的上山下乡,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一代城市青年的人生轨迹,也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广阔天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也是一个劳动力从动员地到接收地的移民问题,牵涉面广,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多。就接收地来说,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安置及其经费来源问题。

从安置方式看,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有一个随着规模和性质变化而变化的历史过程。1955—1957年主要是自愿组织垦荒队,建立青年农庄、农场和林场。1958年,国营农垦系统成为知识青年安置的一个重要场所。^②1964年,由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大量增加,安置形式也

有较大的变动。除部分安排到新建、扩建的农林渔场外,主要是到生产队插队。当年,到生产队插队的知青占上山下乡总人数的66.74%。^{[2](P2981)}但总体上说,“文化大革命”前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主要是以国营农林垦殖场和社队农场为主。这种做法,在1965年国务院召开的各大区和重点省(区)、市安置工作会议上受到重视,成为全国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样板。

“文化大革命”中,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发点相一致,上山下乡知青主要是到边远地区的生产队插队落户,国营、集体农场安置则退居次要地位。如南昌市1968年上山下乡的17616名知青中,分散插队落户的10570人^{[2](P2992)},占总数的60%。但分散插队也带来知青住房困难、不易管理等诸多问题。为此,1973年江西省革委会规定,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再分散插队,而是采取集体插队建立青年点的方式办集体所有制青年队、场,少数(控制在下乡总人数的10%以内)也可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和国营农、林、牧、渔场当农工。对于过去分散插队,一人一队、“一人一灶”的下乡知青,根据因人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集中。^③1974年,各地认真学习和推广湖南株洲市经验,实行厂社挂钩,建立知青场队,下放知青集体插队、集中吃住、集体劳动、统一管理,由此对知青点进行了大规模的集并。1975年,全省在积极推广株洲经验的同时,认真总结本地经验,因地制宜推广由大队创办、生产队联合经营的农、林、牧、渔场安置城镇知识青年的做法。此后的知青安置大致延续了此方式。

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家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拿出了大量的经费,用于建房、补助下乡知青生活、扶持知青场队发展生产。就下乡知识青年的安置费而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放方式和标准都不尽相同。南昌市1961—1964年,到生产队插队的,平均每人拨给安置费140元,其中60%给人民公社,作为插队落户人员的路费、搬家费、修建房屋费和购买小农具、生活用品以及特殊困难补助;40%发给本人,作为到

农村后开始一段时间的生活、生产补助和疾病医疗费等。发给本人的部分,在城市先发20元,其余到农村社队后再逐步发给,以控制知青使用。到农林场的,平均每人300元,统一拨给接收的农场。由农场按规定开支。^{[2](P2998)}1965年后,据国家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规定,对安置费进行了调整,单身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每人发安置费230元,其余由安置单位统一掌握使用。

九江地区1964年安置费用标准为:到生产队插队的,平均每人170元;到新建社队林场安置的,平均每人200元;属于国营垦殖场增补安置的,平均每人300元;回老家安置的,平均每人不超过50元;家住农村小集镇不用搬家就地参加农业生产的,每人不超过40元。1965年,经费标准调整为:单身插队的,平均每人200元;到新建社队林场和新建队、场安置的,平均每人300元;插入现有社、队林场的,平均每人250元。城镇人员下乡需要添置的衣被、蚊帐以及少数日用必需品,按平均每人25元标准,在安置经费中列支。1966年又将到新建扩建国营垦殖场的知识青年安置经费标准提高为平均每人500元,将到农村社队安置的提高到平均每人220元。^{[2](P3025)}

赣州地区1964年的安置标准是:到原有国营农场的每人400元,到新建小型农场的每人700元,到水土保持专业队的每人1327元,插队的每人185元。^{[2](P3069)}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置经费,初期仍按前期制定的标准实施。1973年,城镇青年下乡经费即城市青年安置费改为城市人口下乡安置费,下设知识青年安置费、城镇居民安置费、集体所有制下放人员建房补助费。知识青年安置费成为国家补助的主要部分。当年,江西对知识青年补助标准作了统一规定:到农村插队和建立集体场队的,每人补助480元,其中建房补助费220元,生活补助费160元,农具、家具和其他费用补助100元;到农建师和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的,平均每人400元。^{[2](P2998, P3025, P3069)}“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江西省对知识青年安置经费作了适当的调整,主

要是将到集体所有制的知识青年场队和工商联企业的安置标准提高到580元。另外为在农村结婚安家的下乡知识青年,每人补助建房费300元。^{[2](P2972)}据统计,1968—1979年全省共支出下乡知青经费2393万元。若加上生产扶持资金,则1964—1979年,仅国家拨给江西的下乡知青经费就有2.6亿多元。^{[2](P2972, P2981)}

在经费上补助知青生产生活的同时,各地还根据情况给予了物质补助,特别是为知青提供了大量建房材料、土地资料与其他生产资料。1964—1979年统计,江西全省拨出木材指标14.98万立方米以及大批钢材、水泥,为插队知青建住房103 484间。^{[2](P2981)}此外,上海市也向上海知青建立的队、场提供了大量物质支援。由于农村实行工分制,对大多数知青个人来说,有限的安置经费难以维持其上山下乡初期的生活;而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而言,每年支出的巨额经费又加重了其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负担。

三、回家: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返城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中,与下放农村相对应的,始终有一个返城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知青从就业考虑,多少带有自愿的性质,而且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实际返城的人也不多,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一、二。“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社会失序,这些知识青年中也出现了大批自流回城的现象。只是有关部门采取了不准在城市落户、不准安排工作等严厉的禁止措施,自流回城的现象才有所减少。

1971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规定企业在招工时可以招收一部分经过劳动锻炼两年以上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实际上因城市经济建设规模急剧扩大,所需要的大量招工主要面向应届初高中毕业生。这引起了许多知识青年及其家长的不满,有的因此集体上访。至1972年,有大约10万下乡知识青年返回城镇后长期不归,占当年下乡知青的14.8%。^{[6](P96, P107)}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在给李庆霖的复信中提出“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之后,回城条件有所放

宽。同年,全国中专和技校也开始恢复招生。1975年2月国家计委印发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规定,从社会上招收职工时,首先招收符合留城条件的中学毕业生,也可以招收经过劳动锻炼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对招收知青的条件大为松动。当年,通过招工、征兵、招生、提干等返回城镇的下乡知青为139.7万,占当年下乡知青的59.2%,首次超过下乡人数半数。^{[6](P139)}1976年的全国计划会议,进一步将上一年规定中的“首先”去掉,将留城中学毕业生与下乡知青一视同仁,这实际上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通过招工返城敞开了大门。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返城不仅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主要诉求^④,而且也成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方向。

1972年以前,江西省对知青返城控制比较严,企业需要用人,招工的对象也依次是农村青年、城镇复员退伍军人、过去被精简现在尚未安排工作的职工、城镇社会青年,最后才是按政策回城的下乡知青。下乡知青的安排就业,一般须由大队(贫下中农和带队干部)推荐选拔,公社审查,县有关部门批准。1974年,江西省一方面强调任何部门都不准从下乡对象中招工、招生或安排临时工作,另一方面也开始通过招生、招工、征兵、提干等渠道有计划地分期分批收回下乡知青。1978年,国家调整上山下乡政策,回城面大幅扩大。1979年9月20日,江西省委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意见(试行稿)》,规定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有困难不易解决的插队知青,要优先安排回城,争取在两年内基本解决;各地招收1972年以前有困难的插队知青的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指标,由知青、计划、劳动等部门商定后专项下达,并适当放宽招工年龄,适当扩大招收女青年的比例。这就使上山下乡运动彻底转变为着重解决知青的返城问题。

据统计,1974—1980年,江西全省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生39 434人,征兵27 146人,招工138 380人,提干807人;因其他原因回城的203 590人,总计返城409 357人。^{[2](P2984)}其余上山

下乡知识青年的回收工作到1984年基本完成。

在安置返城知识青年工作中,江西省各地根据下乡知青的来源、去向等具体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和措施。南昌市主要是通过招工、招生、参军和单纯迁户口方式解决;萍乡市采取优先招工、系统消化、转移户口粮油关系、就近安排和转出外地等方法安置知青就业。九江地区通过优先招工、知青部门办企业、顶职顶退、自谋职业等措施安置。实际上,在各种回城方式中,招工、参军、国营及社办农场安置外,因病回城、外迁或单纯迁回户口粮油关系等其他方式也占有相当大比例。如新建县到1983年止安置的8702名知识青年中,因病回城安置的702人,转外地安置1062人。^{[2](P3012)}升学则是知识青年返城的一个亮点。宜春县全县6354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升入大、中专学校的639人,占10%。丰城也有844名知识青年进入大中专学校,占该县安置下乡知青的8.9%。^{[2](P3109、P3123)}

在知识青年大规模回城的同时,也有部分知青由于年龄、婚姻、志愿等种种原因留在了农村。特别是一批在农村已经成家的知青,他们由于政策的限制,无法返城。^⑤为此,中共江西省委采取就地就近安排的办法予以解决。同时还规定,对于那些立志务农、愿意在农村安家落户的知青,从政治上给以鼓励,物资上给以支持,帮助他们解决诸如子女的城镇户口等实际困难。^⑥至1981年,全省插队知青在农村就业的8357人,户口仍在农村的3658人。^{[2](P2985)}对于当时无法返城的知青来说,能够解决自己就业和子女的城镇户口和粮油关系,已是莫大的安慰。

四、共和国历史的缩影: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简要评价

从垦荒活动到“再教育”运动,持续20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共和国曲折历史的一个缩影。它既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又受到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犹如一面镜子,“不仅映射着新中国青年蹉跎与奋进的身影,而且集中反映出共和国曲折发展的足迹”^{[7](前言)}。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工业化虽然快速发展,但依然容纳不下增长更为迅速的劳动力,经济的波动又直接冲击着劳动力的计划安排。这不仅使初高中毕业生难以自主在城镇找到工作,而且在精简城镇人口的过程中将最近时期来自农村的工人乃至干部动员回农村。^⑦之所以出现这种逆城市化的人口控制,根源在于当时把现代化误以为就是工业化的思想认识。部分地,还带有试图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改造落后农村、建设新农村的目的,“文化大革命”前的许多知识青年满怀豪情进军山区、湖沼,乃是他们真诚相信“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他们战天斗地,以至于在后来回首这段岁月时,依然能够大声地说“青春无悔”。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期,红卫兵运动的狂飙突进和国民经济受到的严重冲击,彻底改变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性质,使之变成了一场基于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运动,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被赋予了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它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8]这当然是这场运动所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相反,为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国家和地方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期的返城风潮又对城市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从知青群体看,一代青年的人生轨迹、个人命运在这场运动中被改变,广大知青家长和当地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

因此,如果说从垦荒活动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是国家计划经济下调剂城镇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客观上也对边疆(就全国而言)、山区、湖沼地区的开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广大知识青年也在“大有作为”号召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对自己献出的青春感受“无悔”。那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

从作为红卫兵运动狂飙突进结果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国民经济停滞、波动时的“扎根农村”,无论以社会进步抑或从知青一代人的整体发展的标准来衡量,无疑都应该加以否定。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中,许多知青感受到的是“蹉跎了岁月”。

当然,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部分城镇青年的成长成才和当时落后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有的知识青年经过上山下乡的历练,增加了对农村、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增进了对农民的感情,逐渐成长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材。二是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知青队场,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是推动了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和科技事业的发展。许多下乡知青经过最初的农业生产劳动后,进入农村中小学担任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或者担任赤脚医生,有的则在知青场队担任农业技术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江西仅民办教师数就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了2.7倍。对于当时封闭、落后、缺乏师资的农村中小学来说,知青教师不仅填补了空白,而且为那些少年儿童带去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带去了都市文明,从而极大地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想象。就此而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对大多数知青来说或许是人生的不幸,但对于农村特别是那一时期的许多农村学生来说,又是大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上山下乡中的广大知识青年是江西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评价江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要将其置于整个国家历史进程和知青史中加以观照,也要看到江西自身的特殊性。江西地处长江以南的中部地区,毗邻长三角,历来是一个农业大省,尤其是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江西为全国调出了大批粮食。这种相对较为优越的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条件,使遍及全省各地的知识青年,在生存上有了基本保障。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城乡社会的冲击,减轻了知识青年的痛苦感受,避免了社会出现大的震荡。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从广义上说,来自农村因未能升学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學生也可以理解为知识青年,因此认为上山下乡这一历史现象开始于1953年。见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仅就“知识青年”这一概念而言,这或许是对的,但因此将共和国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上溯到1953年农村学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则比较勉强。一则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而回乡的现象是一种连续的现象,并非始于1953年;二则农村生源本身就来自农村,回乡不存在“上山下乡”问题,只有城镇青年才有所谓上山、下乡问题。而“知识青年”这个特殊的群体,只有与“上山下乡”这个特定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上山下乡”这个特定社会现象也只有与“知识青年”这个特殊群体结合起来,才有历史学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从1955年城镇知识青年下乡开始算起,更符合历史事实。当然,在实际统计中,尤其是1964年以后,有的地方也将回乡安置的知青包括在内。

②“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西省、地(市)、县农垦管理部门先后被撤销,所属垦殖场下放县管,一些垦殖场改为人民公社。但全省保留下来的垦殖场仍安置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8万人,占全国农垦系统安置知青的3.6%。见金光耀、金大陆主编:《辑录》,第2978—2979页。

③1974年开始分散插队的情况急剧减少,但到国营农林场的限制却没有得到执行。如南昌市1974—1977年上山下乡知青总人数分别为7487、8416、7289、6577人,分散插队人数仅分别为80、65、143、37人;而到知青点、知青队的人数分别有4407、5827、4960、4896人,占总数的59.7%、69.2%、68.0%、74.4%;到国营农林场的分别为3000、2524、2186、1644人,占总数的40.0%、30.0%、30.0%、25.0%,均突破省革委会规定的10%限制。分别参见金光耀、金大陆主编:《辑录》,第2992页。

④1978年底1979年初,很多地方发生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求返回城市的请愿事件,其中尤以云南农垦系统知青返城事件影响最大。与此同时,在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最多的城市上海,知青们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请愿活动。这些回城请愿活动,最终推动了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运动的彻底终结和知青的大规模返城。

⑤有相当一部分知青尤其是老三届知青,由于年龄偏大而在农村成家。如安远县1979年有已婚知识青年183名,占在乡知识青年的17%;赣州地区到1977年,有7738人在农村结婚成家,占在乡年满25周岁知青的一半;弋阳县烈桥公社到1976年7月止,在83名下乡知青中,在农村结婚的36人,准备结婚的7人,合计43人,占51.8%。分别见赣州地区、安远县知青办调查组:《关于安远县下乡青年有关几个问题的调查报告》,1978年10月24日,赣州市档案馆藏;赣州地区知青办:《关于统筹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实际困难的调查》,1977年,赣州市档案馆藏;弋阳县革委会知青办公室:《关于烈桥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婚姻情况的调查》,1976年7月9日,上饶地区革委会上山下乡办公室:《上山下乡情况反映》,第11期,1976年8月15日。

⑥对于这些知青,政府主要是给予安家补助、住房补助以及为女知青的未成年子女(15周岁以下)转城镇户口。安家补助标准一般为每人480元;住房困难者补助建房费250到300元,不同地区略有不同。

⑦一方面是动员知识青年下乡,另一方面在经济扩张时,企业又优先从农村招收大量工人。据统计,1966—1978年间,约有二三十万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见金光耀、金大陆主编:《辑录》,第2975页。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金光耀,金大陆.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
- [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M].南昌:内部出版,2005.
- [6]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M].北京:检察出版社,1997.
-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8]蜀文.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青年运动的革命方向[N].光明日报,1972-05-04.

【责任编辑:王立霞】